



新中国电影五十年

第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电影家协会 / 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编辑委员会：李 准 李国民 张思涛
王人殷 佳 明
执行编委：佳 明
特约编辑：业陆河
约 稿 人：佳 明 少 舟 业陆河
多 绯

序

李国民

学术性与群众性是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两大特色。学术性不仅体现于金鸡奖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的研讨与争鸣,从理论上概括电影创作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当年度电影创作的总体趋势,而且更体现于电影节举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为增强电影节的学术特色,中国电影家协会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举办大型学术专题研讨会并集结出版研讨会论文集,使其成为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地举办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中国电影九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电影创作”、“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国电影”等主题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新中国电影五十年。所以,这本书又是这套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系列之一。

综观中国电影发展史,同电影创作相比较,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常常处于滞后状态。80年代初,电影理论、评论界的同志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认真总结中国民族电影创作经验的同时,大胆译介国外电影理论著作、美学观念,展开一次次的学术讨论,其涉猎之广泛、争鸣之热烈,前所未有,使中

国电影理论园地一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影协为此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推动了一次次理论探讨的深入发展。然而,到了90年代,由于社会转型、电影市场面临困境等诸多因素,理论研究又陷入了沉寂,电影评论处于“贫困”状态。尽管我们知道,电影事业走出低谷、再度繁荣牵涉政治经济、政策法规、文化娱乐诸多社会因素,单凭理论研究无法实现,但活跃的理论研究与评论活动能够进一步发挥电影创作的潜能、激活创新思维,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中国影协仍然在协会经费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继承协会前贤之风范,团结一批甘于寂寞、倾心奉献的电影理论工作者,以我们羸弱之躯肩负理论研究之使命。我们坚信现在的努力将在未来结出硕果,倘若我们微薄的努力能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振兴繁荣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将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前不久,胡锦涛同志指出:“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发展中的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细致研究这些新情况,深入探讨、准确把握、正确解答这些新问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将电影节学术研讨会的视点投向电影事业的前沿,热切关注电影创作现状和电影事业改革前进中遇到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以便通过理论形态的准确把握,形成共识,发挥创造潜能,唤醒创新精神,使中国民族电影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繁荣起来。而一年一度电影节之后集结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记录着我们不懈努力的艰难跋涉,也反映了积极参与我们研讨会活动的理论工作者为振兴中国民族电影事业所做的默默奉献。在此,我感谢这些甘于奉献的电影理论工作者,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的研讨会不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更不会收获这么丰厚的理论成果——一本沉甸甸的

学术论文集。

我们愿做得更好！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李国民(1)
不断探索、创新的 50 年	
——关于新中国电影的回顾与思考	陈 播(1)
首任中央电影局局长	
——袁牧之同志片断	程季华(29)
金字招牌的光辉与暗影	
——北影 50 年创作概观	王陶瑞(50)
期待“涅槃”	
——对长影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的回眸	韩志君(84)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开辟国产电影一方天地	
——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 50 年回眸	
.....	马 宁 孙 蕾, 陈若颖(95)
军旗猎猎,红星闪闪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作道路	张 东(121)
改革时代的脉搏	
——回望“南国都市电影”的轨迹	吴厚信(141)
西影和“西部片”	米家庆(151)

现实主义道路与现实主义理想

——峨影新时期创作的回顾与展望……李康生 余 纪(156)

中国“学院派”电影探析

——回眸青年电影制片厂20年……杨恩璞(164)

探索与创新

——广西电影制片厂影片创作生产的回顾与思考

……侯埏中(175)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

……东 涛(蒙古族)(184)

困顿与思考

——浅谈辽影厂30年创作得失……王凯南 邢 丹(191)

改革开放20年中国合拍电影的回顾与思考……张 珏(198)

写在胶片上的历史

——谈新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傅红星(215)

走向新世纪的科教片……李昭栋(235)

回顾和前瞻

——漫谈1997、1998年度的香港电影……朱 岩(249)

人性·个性·终极目标

——新中国电影文学回顾与思考(1949—1999)……王 迪(258)

新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塑造……张延继(280)

喧哗与躁动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的观念冲突……陈晓云(293)

关于电影制片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江 平(323)

警醒·应变·开拓

——新中国电影走向市场之路……彭 云(335)

简论新中国电影的起落及走向……杨兆峰(342)

面对国产电影“入世”的思考……邢 丹(346)

实行股份制经营的实践与思考·····	孙成珂(355)
回顾过去 50 年香港电影导演的来源 ·····	施扬平(360)
一条路走到底	
——兼谈我的喜剧观 ·····	张 刚(368)
珍惜题材资源 限制“乱砍乱伐”	
——对某些革命历史题材新作的批评 ·····	王 玮(376)
编辑《知识老人》剧本的体会·····	刘立中(383)

在第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优秀学术论文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	张思涛(389)
-------	----------

第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新中国电影 50 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	业陆河(391)
-------	----------

附一、第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奖名单

附二、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评奖条例(草案)

不断探索、创新的 50 年

——关于新中国电影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党史资

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陈 播

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探索、创新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创新,形成一系列理论与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思想。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创新,形成邓小平理论,引导亿万人民走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光辉道路。新中国 50 年的电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经历了一条在实践中探索、创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途径,即把历史当作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展望未来,走向未来。回顾新中国电影 50 年的历程,我建议大家应该研究它的历史发展的统一过程,发现历史规律的内在必然,以史作鉴,使中国电影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继续创造新的辉煌。我个人在学习、研究 50 年电影发展历史中,最主要心得是:只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就一定会促使电影出现创作高潮,并形成艺术高峰。我认为,所谓创作高潮应该是一个

时期创作群体形成的，而艺术高峰则是这个时期创作高潮中的一批优秀代表作品形成的。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新中国电影50年历史中有四次创作高潮及其艺术高峰。

一、人民电影开辟了 新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还没有电视的情况下，纪录片《民主东北》、《毛主席和党中央莅临北平》、《淮海战报》、《百万雄师下江南》等片在全国风靡一时，成为人民电影的先行军。随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接着是《中华女儿》、《白衣战士》、《钢铁战士》、《赵一曼》、《白毛女》、《翠岗红旗》、《新儿女英雄传》、《上饶集中营》等影片问世，一批工农兵艺术形象登上了银幕，革命英雄主义大放光彩。1951年3月文化部举办了东北、北京、上海三家国营电影厂出品的“新片展览月”，在全国20个城市展映26部影片，盛况空前。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这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中国银幕上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辟了人民电影新纪元！应该说，这是新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其中的代表作形成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民营的昆仑、文华两公司也拍出《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腐蚀》、《两家春》、《人民巨掌》等一批新影片，也为人民电影作出了贡献。

人民电影在探索创新前进的过程中，对新的生活新的情况

还未看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矛盾:首先发生在《内蒙春光》影片中,有人指出违反《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影片要停映。周恩来总理出来承担领导责任,组织研究改好这部影片,改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继续上映,大大地鼓舞了创作人员。

创作上探索、创新的发展,引来对题材认识涉及方针问题上发生争论:一种是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兵艺术形象,受到广泛赞誉,因此强调“工农兵电影”是方向、是主体;另一种见解,认为文艺表现社会生活是广泛的,仅限于工农兵是题材狭窄论。后来周恩来说,“首先为工农兵”,“应理解为工农兵的立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一争论提高了认识。

关于题材方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讲话》写明有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服务,为什么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呢?讨论的结果,是如何写小资产阶级?是赞扬?还是写改造的过程?由于当时党已提出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认为应写小资产阶级各种不同的改造过程。讨论时缺乏经验,批评言论激烈而伤感情,反映了“左”的情绪出现。

这一时期还出现批评《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是以小资产阶级感情歪曲革命军人、工农干部形象的文章,批评者对于影片积极进步的主要倾向未作具体分析,而将艺术上某些表现不够准确的地方夸大为创作倾向问题,这就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发展。

当时有人看到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等片,提出我们也要创作重大历史的史诗性的影片,组织大型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剧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讨论会上,胡乔木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熟悉和体验这方面的生活,这是符合创作人员的实际情况的。

回顾上述讨论情况,可以看出由于电影对观众的文化生活

影响很大,人民电影在向社会主义电影过渡,从探索到创新,从认识到理解,自然发生新的认识矛盾。这不过是反映党领导人民在我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特定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缺少实践经验,又有激进思想情绪,马克思的本本里没有具体说到,这只有靠我们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里创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矛盾影响到文艺和电影,一直延长到以后各个时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实际上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发展到全国政治大批判。《武训传》是在解放前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赞成拍摄,新中国成立后才完成的。当时全国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又在紧张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此举可能也有以批《武训传》来进行反封建政治思想的教育运动的考虑。但由于大批判的扩大化,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电影首当其冲。事隔34年之后的1985年9月5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不谈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为,尽管这个批判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直接涉及的影片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和赵丹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影片是在党和进步文化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

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胡乔木这一番话,对于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作了周密分析,总结了历史教训,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电影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在指导修改《内蒙春光》后,提议邀请政府各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电影指导委员会”,指导电影事业方针政策、题材规划,对电影创作中一些重要政策情况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时正遇上批判《武训传》的热潮,使得这一委员会无法正常工作,其中个别委员向电影局施加政治压力,有的业务部门委员看剧本时则强调政治性与专业性,导致许多剧本不能或不敢通过,造成自1951年5月至1952年上半年,只出了一部30分钟的短故事片,对比新中国第一年异峰突起般的电影创作高潮,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令人焦虑!1952年4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31次会议,从总体上来缓解这一尖锐矛盾。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在文化部门中,电影是首要工作,今后更要注重”,从而确定了电影在文化部的首要地位。对于剧本太少的问题,他说可用征稿办法解决;他要求作家不仅要到群众中去,而且要和各部门首长建立朋友关系,熟悉生活;剧本能不能用,不能由业务部门决定,还是由宣传文化部门负责审查,这是纠正前一时期电影指导委员会某些委员要专业部门说了算的弊病。陈云在会上指出:编剧人员太少需要补充,如果调人困难,出路靠外稿,出点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后中央发文要求各大军区、各省市支援电影剧本。袁牧之因病休息,调来王阑西、陈荒煤主持电影局工作,不久,夏衍来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夏衍、陈荒煤后来为提高电影的文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月,《文艺报》转载周扬为苏联文学刊物《旗帜》撰写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随后“文协”(后改称“作协”)创作委员会组织作家、批评家和文艺工

作领导人学习讨论会,提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原是30年代苏联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导的。从30年代旧中国到新中国,苏联文学与电影对中国的文学和电影的发展影响很深,对进步读者、观众影响也很大,起了积极作用。我国文学界、电影界是结合苏联文学和电影来学习的。中国这时正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何理解“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人们议论纷纷。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以前所提的现实主义的区别时,有的强调为文学的党性、人民性;有的则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在于塑造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有的引用恩格斯著名的现实主义论述,认为是创作社会主义生活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些讨论对当时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有益的,但是发展到后来,有的则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有的则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的创作方法,是惟一的批评标准。周恩来后来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从我国革命历史与现实生活来认识和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非常鲜明的概括。却未能完全阻止当时“左”的评论思想所影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消极影响继续蔓延。

1953年3月,电影局与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发动作家写电影剧本,许多老作家出来讲授文学创作经验。同月,电影局召开电影艺术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提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批评电影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反现实主义倾向,还多次召开编剧、导演、表演会议,从而使电影创作与制片生产继续探索、创新,并且逐渐出现了生机。《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轰动一时;《董存瑞》、《上甘岭》震撼广大观众心灵;《柳堡的故事》引人入胜;文学名著《祝福》、《家》搬上银幕受到欢迎;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

祝英台》在日内瓦会议上招待放映，名传中外；《天仙配》牵动城乡观众争相观看；《李时珍》诗情画意中传达古代科学家的坚强毅力；《女篮5号》开拓体育领域新篇章；惊险样式的《羊城暗哨》、《天罗地网》、《神秘的旅伴》等影片引起观众很大兴趣；揭露社会矛盾、批评错误思想作风的《洞箫横吹》、《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出现，其中讽刺喜剧片很受观众欢迎。

1956年11月，上海《文汇报》首先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许多电影观众参加讨论，作家、艺术家也参加了讨论，批评一些影片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不尊重剧本创作规律，似乎人人都可以改剧本，把语言、情节、风格、结构的美都改掉了，批评不尊重电影艺术传统，呼吁“救救电影！”《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讨论，认为是有益的。12月，《文艺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电影的锣鼓》，对讨论作了总结，提出要重视电影与观众的联系，重视票房价值；绝不可把“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要求改变行政方式领导创作；尊重中国电影传统，尊重艺术家的风格；改善电影演员的工作环境。这次讨论和这篇文章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这之前，1954年、1956年电影局分别派了到苏联、南斯拉夫和西欧的两个学习团。前者是学习苏联统一管理体制；后者则是学习发挥艺术特性、分散经营。这时在国内还引进了意大利、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国影片，使中国观众广开眼界，发生很大兴趣。电影局领导认识到，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舍饭寺艺委会所在地开会，听取赴南斯拉夫、西欧电影考察团的汇报，决定各厂改革，组成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组，尊重创作人员的自由组合，尊重导演对题材、剧本和电影艺术创作的自由选择，实行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提高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电影艺术水平。这一切标志着一个电影新高潮时期的来临。

二、社会主义电影新的探索与创新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梦寐以求的远大理想,现在开始实现了。人们敲锣打鼓拥上街头庆祝社会主义的到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伟大的探索和创新,然而这将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考验,当时人们没有更多的想到。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3月12日,又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先后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人民内部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论述在全国引起广泛学习和讨论。文艺界就如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在创作中反映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展开了深入学习和讨论。当时的讨论,正是揭示社会主义电影初创时期所发生的新矛盾。电影局有人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认为这是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按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提出来的,是鼓励香花在齐放的竞赛时和毒草作斗争,要学会识别香花和毒草。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整风,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当时在国际上发生匈牙利反社会主义事件,国内也有人提出“政治设计院”,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这就引起发动一场反右派的斗争,在运动中又大大地扩大化,错划了很多“右派分子”,撰写《电影的锣

鼓》文章的钟惦棐,及有的编、导、演也遭到批判和错划为“右派分子”,这对当时正在发展时期的电影,起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扩大化错划右派的错误才彻底平反。

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部分,增加了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一增加非常重要。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试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群众发动起来,在工农各条战线日夜奋力苦战,大炼钢铁,“赶英超英”。由于脱离我国实际经济条件,不尊重科学,苦干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这些在电影厂里工作的人,也是头脑发热,拼力抢拍所谓的“跃进片”——“纪录性艺术片”。

1958年4月,身居要职的康生,在长影和文化部的两次讲话中,指名批判《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影片是银幕上的白旗。将“百花齐放”带来的探索、创新的好形势,说成是“一阵大风浪来了,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按照康生定的基调,在长春召开的长影、北影、八一等三个制片厂创作人员的会议上,又扩大了一批受批判影片;同时上影厂也开了同样的会议,对所出的影片进行检查批判。康生发动这次“拔白旗”的运动,给正在探索、创新的社会主义电影创作很大的危害,幸亏周恩来、邓小平用另一种方式扭转这种错误情况。

在1959年春天,周恩来委托邓小平负责指导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的工作,小平了解情况后,要各厂压缩计划,有的片子可以推到1960年出,以确保献礼影片的质量。周恩来将广州三元里人民当年抗英的史料送给上海《林则徐》片组编导人员,请他们考虑在影片中充实这些重要历史情况,随后他在上海巡视